

ST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SECOND EDITION

DISCOURSE 21

權力——基進觀點

史蒂芬·路克斯——著

林葦芸——譯

張鐵志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審訂

獻給我的父親與尼塔 (Nita)

〈專文推薦〉

走出經驗主義與實證主義

陳樟津

有關「權力」這個主題的作品，現在坊間能夠見到者多如過江之鯽。但是能夠歷經考驗，觀點創新發人深省者，為數就不多了。本書是一本反省性質的作品。原書是歷經多年後再增訂，變成現在這種版本。本書作者引以為自豪的地方是，儘管這是一本反省性的作品，但目前的版本除增加了第二章、第三章外，其餘的地方基本的論點幾乎都原封不動。一本書的論點能夠歷經三十多年的歷史和經驗的檢證，增補一些潤飾品，依原樣再在學術市場上自豪地端出來，可以說相當不簡單。

而且這本書隱藏了一段祕而不宣的學術祕密，就是美國學術界不能見容其他地區的學問，對於學術樹立了山頭，挾持了政治、經濟和工業的優勢，有了獨霸排斥的心態，但是作者也悄悄地把它原有的藩籬拆除了。這正是本書之所以能再度見長的原因。多年前，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就曾通過他和華康德（Loïc J. D. Wacquant）合著的《反省社會學導引》（*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嘆息，歐陸哲學要想到美洲大陸來產生影響大不易。這就無庸提及吸收和運用了。而本書作者居然能夠在英語世界無畏學術霸權的壓力，正面評估、坦然吸

收和運用歐陸哲學的學理長處來討論問題，豐富見識，增加理論深度，實屬難得。

無需諱言，歐陸自 1968 年以來，學術研究就有長足的進步。雖然這些學術研究的進展幾乎都出自左派或跟左派有關的人士，惟這種進展跟政治立場的派系無關，只能說這是人家研究學問的嚴謹和執著有以致也。這些學術研究發揮了本身特有的批判反省的精神，利用先輩原有的知識遺產，能夠見微知著，截長補短，終成一家之言。這些經過潛心研究發展出來的學問，確實發人深省，也能夠提昇我們在知識上的認識，拓展我們研究上的視野。不過話說回來，一般別的門派或一般人對於這些學問要真的能夠領略風騷，再進一步運用來研究學問，恐怕也不是那麼簡單。單是思考的角度不同，看個概念或瞭解個論點，可能持不同角度者折騰了半天，還摸不清所以然。而這些學問對於美國學術界來說，其中有些範疇和領域是根本就不會、也不可能研究和接觸的。這些學問討論的範疇和領域，倒不是無中生有或者不重要的，而是因為視野的關係，在美國學術界（尤其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這一派）的眼界裡壓根兒就看不到。但是看不到，不是問題就不存在；只能說，研究還沒有到家。

本書的作者可能也是看到了歐陸學術研究的這些長處。書中不但推崇並引用了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論點，還提到了布迪厄的思想。這在跟純粹經驗主義、實證主義或行為科學有關的政治科學著作裡還很少見；

因為上述這些思想家的論點只有文化研究或討論它們相關思想的領域才會出現。應該說，這是一項長足的「進步」；因為它打破了門戶之見，開始學習原先它所不知道的東西。這對於做學問確實是有幫助的；科學也正是這樣才建立起來的。

確實這本作品因為有「行家出手」，暗中助一臂之力，讓它有不同凡響的效果。因此在它討論「權力」概念時，不單單能夠輕易地點出了別人所不能，還讓自己理解到：「較廣泛的權力概念的組成元素是可以被研究的，而且我們有充分理由以廣泛的角度理解權力。」因為這樣，這本書也開創了在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領域進行學術研究的新視野。

本書作者的研究取向和吸取知識的態度是值得嘉許的。尤其這是從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領域跨出來的很好的「第一步」，也是很好的一本學習做學問的教材。這本書打從第一章起，便一步一步地告訴我們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研究會出現什麼問題，即使有所改進了（權力的第二面向），對於問題也還是深入得不夠。然後它又告訴我們，因為什麼樣的「啓示」，才更體會出從「定義」上劃地自限的研究，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又應該怎麼樣來跳脫。這是一種很好的反省歷程，對於學術的增進也確有助益。國際學術界這麼多年來就老是有屬於思想家的一些先輩感嘆，述說我們學術界的知識老是沒有準備好；也有人力主國際學術界要組成「國際學社」，共同捐棄成見，反省探索，以便站在紮實的科學基礎上，建立知識的大廈。不用說，本書這樣大方地跨出這一步，也樹立了良好的

楷模。

不過，本書也不是沒有缺點。畢竟在一個地方裡醫久了，表情動作都難抹掉出身的痕跡。本書對於葛蘭西和傅柯等人的研究，可能還要下一點功夫；因為連表述他們思想所使用的語言都講得有點繞口，更不用說他們的問題設定（problematics）了。這裡倒不是說「隔行如隔山」，而是說，要談論一件事，真的是要下功夫去研究它的內容是什麼，不然學習到的東西就不深入，變成半調子了。當然瑕不掩瑜，本書的主力不在此，就無庸苛求太甚。每一本書都有每一本書的任務，既然它只是要提出「基進觀點」，那麼它的任務應該是已經完成了。我們只能期待本書作者在另一本作品，為我們說明如何研究「第三面向」（或更多面向）的權力領域。

2006/09/07

本文作者為前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導讀〉

啟蒙教授的解放之路

——在戰後西方社會科學發展脈絡中閱讀《權力：基進觀點》

吳叡人

如果你想將一個暴君趕下王位，你必須先摧毀他在你心中築起的王位。

如果不是在你們自己的自由之中殘存著暴政，在你們自己的驕傲之中隱伏著羞愧，一個暴君如何能統治一群自由而驕傲的人民？

——紀伯倫（Khalil Gibran），
《先知·自由》（“Freedom XIV,” The Prophet）

1

牛津出身的路克斯（Steven Lukes）是一個典型的文藝復興人。他不僅博通百家，並且喜好與人爭辯或對話。在專業訓練上，他至少跨越了哲學、社會學與政治理論：以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研究成名，但也涉入馬克思主義與道德哲學的糾葛；長期鑽研「結構與個人」的古典社會理論難題，卻又捲入當代政治哲學「自由與共同體」的論戰之中，並且為了這場論

戰還「不務正業」地寫了一本名噪一時的哲學小說《啓蒙教授漫遊記》（*The Curious Enlightenment of Professor Caritat*）；在謹守分際地討論哲學的「人論」（on person）之餘，又忍不住要對已故的社會人類學大師蓋爾納（Ernest Gellner）在遺著《語言與孤寂》（*Language and Solitude*）之中，挾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以批判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公案進行仲裁。在政治上，他在 1980 年代曾經支持英國攻打福克蘭群島，1990 年代則強烈主張西方應對紛爭中的巴爾幹半島進行人道干預，然而如今他堅定反對美英的伊拉克戰爭以及美國的新帝國主義，並且與希鈞斯（Christopher Hitchens）等九一一之後右轉的老左派知識份子公開論戰、正面決裂。

顯然，這是一位好奇心旺盛，道德感強烈的知識份子的圖像。我們在眾聲喧嘩之中，不時聆聽到智慧與倫理雜沓而厚重的跫音。不過，故事還不僅止於此而已。這冊《權力：基進觀點》，同樣也是「啓蒙教授」路克斯與世界這段漫長的齟齬、爭辯過程中，另一次奇妙遭遇的產物。這次遭遇，涉及了二次大戰後西方政治學與社會學界延燒多年，牽連甚廣的一場——或者應該說，一系列——關於「權力」性質的重要論戰。在這場漫長的對話過程中，路克斯先後兩次出手：1974 年，他先以初版的《權力：基進觀點》介入戰局，然後在蟄伏、聆聽各界意見三十一年後，他再度以這本增補後的《權力：基進觀點》第二版回應他的批評者，並且辯護自己的原始主張。換言之，這本篇幅不大的書，其實涉及了一個複雜廣泛的對話脈絡。從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角度觀之，追索這個對話脈絡，應該會有助於我們掌握作者的論證與寫作意圖。

2

這一系列關於「權力」的漫長論戰，大體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50 年代後半到 1970 年代後半。點燃第一階段戰火的，是社會學大師密爾斯（C. Wright Mills）1956 年的經典《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密爾斯從左翼的觀點，拆穿了 1950 年代的「美國夢」假象，指出在號稱「民主」、「多元」的美國，其實權力與財富都集中在少數統治菁英手中。這個基進論點，立即受到功能論社會學大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來自右翼觀點的批判。帕森斯與密爾斯在 1950 年代後期的交鋒，進一步引發了兩場 1960 年代的相關辯論。一場是英國的米立班（Ralph Miliband）和希臘裔的柏蘭札斯（Nicos Poulantzas）兩位歐洲馬克思主義理論名家關於行動主體與結構的辯論。這場馬克思主義理論陣營內的論戰，一直延燒到 1970 年代末期。另一場則是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者所點燃的戰火。1961 年，耶魯大學的達爾（Robert Dahl）出版《誰統治？》(*Who Governs?*)，批判密爾斯的權力菁英論，重申美國是權力分散的多元主義社會。有趣的是，達爾的主張，引發了政治學者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和巴拉茲（Morton Baratz）的批評。他們指出，達爾使用一種過於平面的「權力」概念，

以致無法看到一種更深層的權力運作方式，也就是將特定議題排除於決策過程之外的權力。

達爾和巴克拉克與巴拉茲的辯論，引發了年輕的英國社會理論家路克斯的興趣。在一次巴黎大學的演講中，他對這兩方提出批判，指出他們都沒有看到隱伏在最深層的權力運作方式，也就是從根本去影響、塑造被支配者的價值觀，使他們同意強者的支配。這次演講內容，就是 1974 年的《權力：基進觀點》初版的濫觴。在書中，他將前述深層權力概念稱之為權力的「第三面向」，以有別於達爾的「第一面向」與巴克拉克和巴拉茲的「第二面向」，並且引用當時開始受到西方重視的義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的「霸權」(hegemony) 概念，支持自己的論證。

在這個階段，論戰的導火線是密爾斯所提出的「美國有多民主？美國是不是多元社會？」這個問題。這個經驗問題看似不難檢證，但是對「權力」概念的不同理解，卻導致了對這個經驗問題相當不同的結論。在 1970 年代初期的西方知識脈絡之中，相較於達爾保守的古典行為主義和巴克拉克與巴拉茲折衷的「改良行為主義」，路克斯具有新馬克思主義色彩的論證，毫無疑問地是一種「基進的」觀點。

第二階段是從 1980 年代到 2000 年代初期的今日。1980 年代之後，在北美和英國社會科學界，行為主義和功能論早已沒落，而關於「結構一個人」的爭論，似乎也因主流學界取得一個折衷主義的共識而暫告平息。另一方面，先前被視為異端

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途徑卻盛極一時，儼然新興的研究典範。不過，這個研究典範內部也出現兩個重要的發展趨勢。第一，傳統馬克思主義過度偏重結構的傾向有了改變，越來越多學者開始重視個人主體的能動性問題。這派學者當中最著名的是以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埃斯特（Jon Elster）和普許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以及加州大學經濟系教授羅莫爾（John Roemer）等人為主的「分析馬克思主義」（analytical Marxism）學派。第二，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如盧卡契（György Lukács）與葛蘭西等理論家作品的影響，傳統馬克思主義偏重「下層建築」——也就是經濟和階級分析——的傾向也有了變化，學界開始注意「上層建築」的相對自主性，於是國家、政治、意識型態分析也重新進入社會科學家的研究視野。當然，這兩個新理論傾向的出現，相當程度反映了當時西方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實踐失敗的反省。他們彼此相互激盪、對話，在 1980、1990 年代之間，從不同角度對「權力」現象提出了種種富有創意的思考，進一步支持、補充、修正或者挑戰路克斯在 1970 年代中期提出的「第三面向」論。

分析馬克思主義者受到「方法論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影響甚深，主張個人才是社會分析的基本單位，而作為理性的行動者，個人具有自主與能動性。從這個角度，他們不只反對結構決定論，並且對古典馬克思主義「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或者葛蘭西「霸權」這些似乎過度低估個人自主性的概念抱持懷疑的態度。出身法國高等

師範學校，曾受業於阿宏（Raymond Aron）和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等大師的挪威裔政治理論家埃斯特借用認知心理學理論，主張所謂「被壓迫者的同意」事實上是被壓迫者為適應無法改變的現實時的自我心理調整。波蘭裔的傑出政治經濟學家普許沃斯基則提出「同意的物質基礎」（material basis of consent）概念，主張被壓迫者的同意必須基於某種交換關係才會成立，因此不存在什麼神祕的「霸權」。此外，深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耶魯大學政治系教授史考特（James C. Scott），則從底層群眾的主體性觀點否定壓迫者「霸權」的存在。他主張，被壓迫者只是陽奉陰違而已，他們從未放棄抵抗，儘管弱者的武器，只能是一種間接、隱晦的抵抗。他稱這些必須細緻爬梳歷史證據才能發現的抵抗為「隱蔽文本」（hidden transcripts）。

對於重視上層建築自主性的學者而言，國家以強大的權力來塑造、影響民間社會，或者強勢階級以不成比例的資源來塑造或誤導弱勢者的信念與價值，當然是可能的。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霸權」形成的經驗機制進行實證研究，如社會化、制度化等。最著名的例子，是政治學者葛分塔（John Gaventa）研究阿帕拉契山區貧困白人的名著《權力與無權》（*Power and Powerlessness*），以及雷頓（David Laitin）研究奈及利亞族群認同形成的經典《霸權與文化》（*Hegemony and Culture*）。

除了經驗社會科學之外，西方政治、社會理論界從 1970 年代起，也出現了關於種種「權力」思考的新典範。最有名

的，當然是傅柯所描繪的那個無路可出的「規訓社會」噩夢。有論者甚至指出，這是一種遠遠超過路克斯視野的「極基進」（ultra-radical）權力論。另外，英國左翼政治哲學家拉克勞（Ernesto Laclau）則將「霸權」概念相對化，重新理解為一種在權力極度分散的現代情境中，暫時而相對穩定的社會共識。在這裡，「霸權」已經被轉化成一個描述性、甚至規範性的概念了。

在這個階段，我們看到密爾斯在三十年前點燃的戰火繼續延燒，只不過交戰者已經從「保守對基進」轉移到基進陣營內部，而焦點已經從權力現象運作的不同層次，轉移到最深層的權力運作，也就是「霸權」或者「壓迫者取得被壓迫者之同意或默許」的現象之上了。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三十年來西方社會科學知識的發展浪潮，已經將路克斯的「第三面向」論逼到論爭的第一線，直接或間接地成為同儕或後進檢驗批判的對象了。這就是《權力：基進觀點》第二版出現的知識脈絡。

3

在觀察、蓄勢三十年之後，路克斯以《權力：基進觀點》的增補新版，重新介入這場漫長而戰線不斷延伸的論戰，為自己三十年前的論點辯護。三十年前，他站在左派立場，挑戰右派維護現狀的保守觀點。如今在這場基進陣營內部的辯論之中，他卻成為「中間派」，左打傅柯的基進悲觀主義，右批史

考特對弱者主體性的一廂情願，以及埃斯特對現狀的過度合理化。更值得玩味的是，在三十年前的初版之中，他援引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理論批判行為主義者，然而在三十年後的第二版之中，為了辯護葛蘭西的「霸權」以及馬克思的「虛假意識」概念之可能與存在，他卻廣泛駁雜地引證古典自由主義哲學家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彌爾（J. S. Mill），當代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哲學家紐絲邦（Martha Nussbaum），以及後殖民理論家法農（Frantz Fanon）的作品，來駁斥分析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另一方面，為了證明解放的可能，他也引用受涂爾幹社會學影響甚深的當代刑罰社會學家葛蘭（David Garland）的經典著作《懲罰與現代社會》（*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來批判前期傅柯的後現代式虛無主義之缺乏經驗基礎。

這種看似戲劇性的知識結盟轉換所反映的，不是實用主義或機會主義，而是路克斯對不同時代知識與道德典範轉移的認知與回應：同一個問題在不同的時代，產生了不同的意義。三十年前，《權力：基進觀點》初版的目的在揭露民主社會中隱藏的支配與壓迫形式；三十年後，《權力：基進觀點》第二版的目的，卻在提醒虛無犬儒的後現代社會，提醒沉溺在甜美的消費夢幻中的我們，那些看不見的支配與壓迫並未消失，我們尚未解放。不管是面對當年自滿的行為主義者，或是今天幻滅的後馬克思主義者，路克斯的立場都是一致的：**強勢者誘導、塑造、影響弱者，使弱者同意強者的支配的現象，理論上是可**

能的，經驗上是普遍存在的，在我們認識到這個事實，並且努力運用理性打破這種霸權之前，我們都不是自由的。

這個關於權力的命題是否普遍有效？路克斯謙遜地否定了，因為他認為權力是一種「本質上易受爭議」（essentially contested）的概念，所有關於權力的理解，由於受到論者對人性的哲學預設與文化價值的制約，都是片面的、局部的，而且會引發爭議的。因此路克斯承認他的權力論，是一個對人類的自由與理性、對跨文化理解的可能存有預設，因此必然會引發擁有不同預設者反論的爭議性命題。然而這不妨礙他以哲學家的細膩、清晰與誠實，將自己對人的預設與信念娓娓道來，並且以此訴求所有誠實讀者的理性與信念。

讀者，你，有時也請傾聽那不安、猶疑的心罷：是否你的靈魂仍然殘留有專制的鞭痕、蒙昧的咒詛，是否你的理性正沉睡在那甜美的商品夢幻之中？你，你有多自由？

然而我們必須說，這一切都不妨礙信念堅定的路克斯教授在他的解放之路上繼續漫游。或許我們可以這麼想像：如果已經年近七十的路克斯在三十年後依然健在，依然充滿熱情與好奇心，依然精力充沛地與這個不完美的世界齟齬不休——當然我們必須先假設愚昧的人類不會先毀滅這個世界——那麼他或許會再出一冊《權力：基進觀點》第三版，在書中，我們垂暮的啓蒙教授或許會在一一駁斥種種關於人類解放的幻想與幻滅之後，用浮士德博士般的感嘆語氣，加上這段他鍾愛的解放哲學家斯賓諾莎《倫理學》（*Ethics*）的結語：

儘管我前面所指出的那條引領向自由的道路現在看來似乎很困難，但是還是可以找得到的。當然，不容易找到的事物必然是困難的。因為，如果解放就在眼前，可以毫不費力地到手，那為什麼幾乎人人都對它視而不見呢？然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既困難而又罕見的。

2006/09/29 寫於劍橋大學

本文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致謝

我要向下列幾位學者致上最深的謝意，他們就我在本書裡提出的論證做出了批評：濟柏（Vivek Chibber）、柯恩（Jerry G.A. Cohen）、科恩（Stan Cohen）、佛萊（Suzanne Fry）、葛蘭、哈金（Ian Hacking）、哈定（Russell Hardin）、海伊（Colin Hay）、海沃特（Clarissa Hayward）、伊維格（Jennifer Heerwig）、荷姆斯（Stephen Holmes）、羅耀（Steven Royal）、波利特（Katha Pollitt）、普許沃斯基、羅莫爾與舒珀（Gail Super）。我還要感謝我的出版商甘迺迪（Steven Kennedy），因為他拒絕把「不」當成回答來接受，而且拒絕將「定稿」當成定稿來接受。